

隐喻认知功能探索

An Exploration of Cognitive
Function of Metaphor

■ 谢之君 编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www.fudanpress.com.c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隐喻认知功能探索 / 谢之君编著.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7. 6

ISBN 978 - 7 - 309 - 05520 - 7

I. 隐… II. 谢… III. 隐喻—研究 IV. H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65161 号

隐喻认知功能探索

谢之君 编著

出版发行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 200433

86-21-65642857(门市零售)

86-21-65118853(团体订购) 86-21-65109143(外埠邮购)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责任编辑 庄彩云

总 编 辑 高若海

出 品 人 贺圣遂

印 刷 句容市排印厂

开 本 787×960 1/16

印 张 12.5

字 数 205 千

版 次 2007 年 6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309 - 05520 - 7 / H · 1113

定 价 2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人类语言离不开思维,思维离不开概念判断、逻辑推理等。要揭示语言的本质,需要透过语言现象,分析和了解认知主体的思维方式。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人们的思维方式与人们的行为方式(包括社会存在方式、个人经验与社会文化模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隐喻研究就涉及这些复杂的关系,因为“隐喻普遍地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不但存在于语言中,而且存在于我们的思维和行为中。我们赖以思维和行为的一般概念系统,从本质上讲是隐喻式的”(莱考夫)。

西方语言哲学一直是客观主义占统治地位,语言的天然主观本质因素和纯客观逻辑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语言中总是存在着与其客观真值不一致的现象。这一点在隐喻性语言中尤为突出。因此,语言学家一般倾向于采取将隐喻性语言边缘化的方式,认为它是语言中的特殊现象,与常规语言不同,不能作为意义研究的典型的、带有普遍性的语料,或者必要时只能给予特殊的解释。另一方面,也有一些西方学者很早就发现隐喻性语言所体现出来的研究价值。例如,意大利杰出的法学家和哲学家维柯,法国著名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学家卢梭,英国哲学家、修辞学家理查兹,法国著名哲学家、符号学家利科等,都将隐喻作为重要的思考和研究对象,揭示出了隐喻的认知意义和“无所不在”的普遍原则。通过隐喻更能看清楚语言的本质,这个本质的核心就是“用一个事物理解另一个事物”。这不仅是思维的本质方式,也是语言起源、创造、变化和运用的本质规律。

隐喻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我们将“metaphor”译为“隐喻”,并不能反映英语“metaphor”本身“将一个事物转移到另一个地方”的原始意义。但需要指出的是,本书用“隐喻”这一术语,作为动态过程,它应该是“隐喻化”;作为思维方式,它应该是“用一个事物理解另一个事物”。

隐喻研究的对象包括语言中的显性隐喻表述,也包括隐性的、表面看来

不是隐喻、但其形成过程是隐喻的语言现象。另外,艺术、绘画、宗教、建筑和标志等非语言现象也体现隐喻认知特征。既然隐喻是一种认知方式,那它就不是单纯从语言角度研究的问题,必须涉及与思维密切相关的哲学、心理学和一般的认知原理。语言学家的任务是运用这些理论对语言现象做出科学解释。

本书取名《隐喻认知功能探索》,把重点放在隐喻的“认知功能”上,以区别于其修辞功能。“探索”是一个过程,主要指西方学者对隐喻认知功能的探索。第一章首先回顾了西方思想家的有关论述和思考。没有前人这些理论上的探索,就不可能出现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隐喻热和认知语言学思潮。近年来,西方隐喻研究由抽象思考转入具体分析,著述繁富,令人目不暇接。限于著者的水平和阅读兴趣及范围,只能“自以为是”地撷其要文要义进行归纳介绍。我认为,要比较完整地理解隐喻的认知机制,有几位学者的理论观点不容忽视。首先是莱考夫的“概念隐喻”理论(见第三章)。他与约翰逊合写的《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言简意赅,深入浅出,大量的实例和严密的推理,无可辩驳地论证并确立了隐喻是“用一个事物来理解另一个事物”的命题,把隐喻研究从象牙塔里解放出来,同时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开启了一扇大门。著者在书中总结了莱考夫的主要观点,结合汉语实例进行印证分析,并在隐喻系统性解释上,根据自己的理解,增加了用一个源域概念理解多个对象概念的内容。其次是英德克亚的互动理论(见第四章和第五章)。如果说莱考夫让人们相信隐喻是认知的机制,英德克亚则进一步告诉人们其内在工作原理。他明确划分了认知的层次性,界定了隐喻的不同类型,将概念扩展为概念网络,清楚地描写了隐喻的创造机制。另外,吉伯斯(Gibbs)和玻尔森(Persson)在隐喻理论应用方面的探索也给我们不少启迪(见第七章和第八章)。理论只有在应用中才能真正体现其价值。

本人在书中尝试运用隐喻理论对语言现象进行探索。在第六章提出了语言和文字起源的“隐喻说”,算作一家之言;在第九章和第十章分别从认知隐喻角度对翻译和外语教学提出了初步见解,当然还不是成熟或完善的应用理论体系,但提出来讨论、研究还是十分必要和有益的。书中的部分章节曾在《外国语》、《外语与外语教学》等学术刊物上发表,收入本书时都做了较大的增删改动。

本书能够面世,我要首先感谢我的导师、上海外国语大学王德春先生,11年前我作为博士生求学先生门下,开始对认知隐喻研究产生兴趣,得到

了先生孜孜不倦的教诲与指导,使我终身受益,难以忘怀;复旦大学出版社庄彩云老师在本书编辑出版过程中做了大量工作;我的研究生袁飞、梁秋花等为本书部分章节提供了资料,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感谢!

谢之君

2007年春节于上海聚丰园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西方思想家对隐喻认知功能的思考	12
一、古典理论	12
二、维柯：“理据就是隐喻”	14
三、卢梭：“语言在最初是隐喻的”	16
四、卡西尔：“原始人用隐喻思维”	17
五、理查兹：“隐喻无所不在”	18
六、布莱克：相互作用论	20
七、雅可布逊：聚合/选择说	22
八、沃尔波鲁格：心理转换	24
九、利科：“隐喻创造意义”	26
第二章 隐喻：从修辞格到认知	30
一、修辞学意义上的隐喻	30
二、比喻辞格的隐喻认知共性	32
三、DM(dead metaphor)的启示	34
第三章 概念隐喻与概念整合	37
一、莱考夫其人	37
二、“概念隐喻”的含义	38
三、辞格是概念隐喻的不同类型	40
四、隐喻概念的系统性	48
五、体验哲学	53

六、概念整合理论	56
第四章 隐喻的界定与相似性	59
一、隐喻的界定	59
二、隐喻与类比	66
三、相似性创造的可能性	71
四、相似性创造的必要性	74
第五章 隐喻的投射机制	80
一、范畴化认知	81
二、表象世界和符号世界	89
三、建构主义的认知互动	90
四、隐喻中的认知关系	94
五、隐喻的投射机制	96
第六章 隐喻与语言阐释	105
一、隐喻与语言文字的形态发生	105
二、隐喻与一词多义	111
三、隐喻与社会文化意识	117
第七章 核心语义与隐喻意义	123
一、字面意义与思维方式	123
二、语义的指称	124
三、语义的特征	125
四、词语的定义	126
五、歧义、多义与创新词汇	128
六、范畴理论与词义	130
第八章 图示隐喻与语义互补模式	134
一、图示与隐喻	134
二、语义成分与原型理论图示	135

三、隐喻化图示模式的意义	140
四、语义三角的隐喻解释	142
五、隐喻与言语交际行为	148
 第九章 翻译中的隐喻性认知	158
一、翻译是一个认知过程	158
二、翻译中的隐喻认知体现	159
三、相似性的二重性认知	162
四、翻译理论本身的隐喻认知	163
 第十章 隐喻与外语教学	164
一、隐喻是一种认知理论模式	164
二、隐喻是一种认知教学理念	165
三、词汇层面的隐喻认知	166
四、语法范畴自身的认知	169
五、对象域描写与语言技能	170
六、用已知理解未知	174
七、对“教学法”本身的隐喻认知	176
 余 论	177
一、关于隐喻的普遍性	177
二、语义特征问题	178
三、启示	179
 参考文献	181

绪 论

在西方,隐喻(metaphor)是作为修辞学上的一个术语提出来的。西方对于隐喻的研究有悠久的历史,自亚里士多德(Aristotle, 公元前384—前322年)至今已有两千多年。西方的隐喻研究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1. 自亚里士多德到20世纪30年代;2. 从20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3. 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

第一个阶段以亚里士多德的隐喻观为代表。亚里士多德在其著作《诗学》中说:“隐喻字是把属于别的事物的字,借来作隐喻,或借‘属’(genus)作‘种’(species),或借‘种’作‘属’,或借‘种’作‘种’,或借用类比字。”(第二十一章。罗念生译,中国戏剧出版社,1986)。他在另一本著作《修辞学》中进一步说明隐喻,又重申了这四种方式的隐喻(《修辞学》,pp. 177—178)。这样,亚里士多德就把隐喻同认识中的概念挂起钩来,把隐喻看作是概念范畴之间的置换。对于隐喻的重要性,亚里士多德说:“隐喻是天才的象征,它不是能够学会的,因为好的隐喻意味着从相异的事物中觉察到其相似性的能力。”(Ibid, p. 1410)同时,亚里士多德在其著作中多次明确指出:隐喻本身是作为添加在语言之上的装饰物而存在的,人们以特殊的方式在特殊的时间和场合下使用它。

亚里士多德的隐喻观在西方的影响是全面的。各派隐喻理论和观点中都可以看到亚氏理论的影子。如修辞学依据“属”、“种”概念来对辞格进行划分,但在语义上视为偏离现象而从整体上将隐喻视为装饰品。隐喻的替代论和对比论接受了隐喻相似性的特点,侧重于相似基础上的对比和替代;而概念隐喻说则注重亚氏所讲的“属”与“种”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作进一步的认知功能的研究。总的说来亚氏的隐喻理论为以后隐喻研究的发展奠定

了初步的基础。

在这个时期的另一个代表人物是古罗马修辞学家昆提良(M. F. Quintilian, 公元 35—95)。他从修辞学的角度出发,把自亚里士多德以来对语言和隐喻研究的古典主义方法论推向了一个顶点,他的著作中融入了前人大多数有关的论述,成为“对古典的一次系统的重述”(转引自 J. W. H. Atkins, 1978)。他着重指出了隐喻四个方面的转义特征:1. 有生命的转义为无生命的;2. 无生命的转义为有生命的;3. 有生命的转义为另一有生命的;4. 无生命的转义为另一无生命的。和亚里士多德一样,他将隐喻视为“点缀在风格之上的高级装饰品”。单从修辞学的角度讲,这种认识也有其自身合理的地方,对此不能苛求。

亚氏修辞学中渗透着逻辑的、认知的哲学思考。这被一些哲学家继承了下来。

17 至 18 世纪意大利杰出的法学家和哲学家维柯(Giambattista Vico, 1668—1744),在人类历史上是第一个从语言和文化的角度对原始人类的人性、思维方式、意识形态、宗教、社会制度、法律、历史、习俗等文化现象进行统一、全新解释的人,他把人们使用的各种语言、人们所创造的神话和传说放到它们所产生的环境中来审视它们所依赖的方式,因为语言与其所表达的客观世界是密不可分、有机结合的。这个方式就是隐喻,因为它总是处于“人的创造”的中心。

法国哲学家、教育家、启蒙运动思想家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和德国哲学家、批评家赫尔德(John Gottfried Herder, 1774—1803)在《语言的起源》^①(*On the Origin of Language*)一书中认为人类语言的起始就是隐喻性的(The first language had to be figurative)。卡西尔(Ernst Cassirer, 1935—1945)将隐喻思维称为“神话思维”。他认为在人类文化的早期阶段,语言的隐喻性质似乎压倒其逻辑的和推理的性质。

早期哲学家对于隐喻的思考为 20 世纪隐喻的语义学研究提供了认识上的基础。

第二个阶段是语义学研究时期。这个时期以理查兹(I. A. Richards, 1893—1979)的《意义的意义》(*The Meaning of Meaning*)和《修辞哲学》

① 该书由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出版(1966),书中收录了卢梭与赫尔德关于语言起源的论述。

(*The Philosophy of Rhetoric*)为标志。理查兹的兴趣不仅是纯哲学上的思考,还结合语言的实际问题对语义学进行研究。他提出了著名的隐喻“无所不在的原则”(omnipresent principle),认为语义不是孤立的现象,它与话语有密切的关系。

但是本世纪初以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隐喻的研究受占统治地位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影响,这个时期的代表人物主要有雅可布逊(Roman Jakobson, 1896—1982)和布莱克(Max Black, 1909—1988)。

美籍俄裔著名语言学家雅可布逊在《语言的功能》(*Function of Language*, 1965)中认为,语言体系可以用两种表现形式来说明:隐喻和换喻。其中隐喻表现的是以相似性为特点的选择关系,换喻表现的是以毗邻性为特点的组合关系。

美国哲学家布莱克在康乃尔大学学术刊物《语言与哲学研究》上发表了长篇论文《模型与隐喻》(*Models and Metaphor*),从结构主义的角度对理查兹提出的“语义互动理论”进行了发挥和阐释。

第三个阶段是多学科研究阶段。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对于隐喻的研究出现了空前的热潮。心理学、哲学、语言学、符号学、认知科学、人类学等学科的专家、学者纷纷表现出对于隐喻的浓厚兴趣,这个阶段出现了各种新的隐喻理论。但是这个时期的隐喻研究并不处于同一个层面上,研究的对象、目的和方法各有不同。如同霍乃克(Honeck)所说:“任何一种隐喻视角的研究对从另一个角度研究的人来说都有可能说对方不是在研究隐喻”(Cognition and Figurative Language: Introduction, 1980)。究其原因,是因为对隐喻的定义见仁见智,这不仅反映了隐喻研究中的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同时也反映了隐喻研究涉及层面的广泛性。

1971年,希布莱斯(W. Shibbes)收集统计了之前有关隐喻研究的学术著作,编辑出版了《隐喻主要书目辑录》(*Metaphor: Annotated Bibliography in History*)一书,据统计,收在此书目中的著作约有4000种。

1975年,法国著名哲学家、符号学家利科(Paul Ricoeur, 1913—2005)出版其隐喻研究专著《隐喻的规则》(*A Rule of Metaphor — Multidisciplinary Studies of Creative Meaning in Language*),全面评述传统修辞学在隐喻研究方面的贡献和局限,在话语语言学范围之内对隐喻进行研究,并主张从词汇单位过渡到句子单位乃至话语单位来考察隐喻的功能。

至20世纪70年代后期,欧美特别是美国学术界对隐喻研究的兴趣达

到极点,盛况空前,掀起了一股“隐喻狂热”(Metaphormania),有关隐喻研究的学术会议相继召开,隐喻论文集和专著不断涌现,各种新的观点和理论也层出不穷。

1977年,“隐喻与思维”(Metaphor and Thought)学术会议在美国伊利诺斯(Illinois)大学召开,与会者包括各个学科的专家学者百余人。会议论文后由英国学者安德鲁·奥托尼(Andrew Ortony)编辑整理为《隐喻与思维》(Metaphor and Thought)一书,于1979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

1979年,在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Davis)分校再次举行了国际性的跨学科隐喻研究学术研讨会,会议重要论文由霍乃克和荷夫曼(Hoffman)编辑成《认知与修辞》(Cognition and Figurative Language)一书,1980年由Hillsdale出版社出版。

1980年,莱考夫(Lakoff)和约翰逊(Johnson)出版《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Metaphors We Live By)一书。这是十分重要、影响巨大的一部隐喻专著。作者在书中将隐喻纳入人的行为活动、思维方式、概念范畴、语言符号等领域进行全面细致的考察,其提出的概念隐喻的命题,具有哲学和语言学的重要意义。它是隐喻研究中的又一个里程碑。

1982—1983年之间,荷夫曼和史密斯开始主编发行隐喻研究学术专刊《隐喻研究公报》(Metaphor Research Newsletter),并于1986年改刊为《隐喻与语义研究》(Metaphor and Semantic Activity),一直发行至今。

1985年,万·诺潘(Van Noppen)等人收集统计上世纪70年代以前的隐喻研究论著,并出版了又一部隐喻研究著作目录集,书中所收著作数目计4317种。

1994年,《语用学杂志》(Journal of Pragmatics)出版了“隐喻和符号类象性”(Metaphor and Iconicity)专号;1995年7月号该刊又出一期“隐喻与语用”(Metaphor and Pragmatics)专号。作者大多以皮尔斯(Pierce)的符号学理论和莱考夫的认知概念理论对语言现象进行研究和分析。

1990年戴维斯(Steven Davis)编辑出版了一部《语用学选读》(Pragmatics: A Reader),其中在“语言的非字面用法:隐喻和讽喻”(Non-literal Uses of Language: Metaphor and Irony)一编中,编选了6篇有关文章,包括约翰·塞尔(John Searle)《论隐喻》(On Metaphor),斯玻伯(Sperber)和威尔逊(Wilson)《关联论》(On Relevance)中的有关章节,并编发了不同观点的文章。值得注意的是,厄格曼(Gergmann)和戴维森(Davidson)的文

章从认知的角度研究语言运用中的多义现象,为语用学的研究开辟了一条新途径。1990年,英国语言学家斯威策(Sweetser)的《从词源学到语用学》(*From Etymology to Pragmatics*)一书出版。她认为隐喻在一词多义中的运作机制,和在语法、语用中是一致的,并指出语言的创生和使用遵循着从现实世界领域(real world domain)到认知领域(cognitive domain)到言语行为领域(speech act domain)(D1→D2→D3)这样一个认知模式。

1990年英国语言学家卡纳·玻尔森(Gunar Persson)出版《语言、模式和隐喻》(*Language, Models and Metaphor*)一书。他从独特的视角将语言中的模式(图示模式)^①看作是作者隐喻思维的结果,实质上都是一种比喻,因此不能将它们看成是语言的全面真实的复写(如语义三角、生成语法树型图、语音图示、语义网络,等等),而应视为从某个角度对语言的隐喻式的描写(metaphorical representations)。因此它们各有自己的地位和作用,把它们整合起来似乎可以看到语言的全貌。

1994年,吉伯斯(R. W. Gibbs)出版《思维的诗学》(*The Poetics of Mind*)。作者认为,隐喻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是用来交际和说理的特殊修辞手段,而且也是一种根本的大脑能力。人用这种能力理解自身和世界,方法是通过把一个领域的知识在概念上映现在另一个领域上。隐喻在语言、思想、科学、法律、艺术、神话、文化中无所不在,这说明隐喻是人类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这并不是说隐喻是人类思想和语言理解所有方面的构成部分,因为人的体验和一些思想模式是非比喻性的。然而可以说,人的许多认知,是由习惯于自然地用隐喻的方式进行思考所决定的。我们的任务是要确定隐喻在构建日常思想中所起的范围界限到底在哪些方面。该书被莱考夫称为“认知科学的佳作”(见 *The Poetics of Mind*《思维的诗学》封底)。

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隐喻研究在西方已达到白热化程度。随着隐喻研究的不断深入,领域不断扩大,应用研究也在政治、经济、宗教、艺术、教学等领域中广泛展开。这个时期影响较大的有比宾·英德克亚(Bipin Indurkha)的《隐喻与认知:互动观》(*Metaphor and Cognition: An Interactionist Approach*),它是以教学方式写成的,由浅入深,由语言层面的隐喻表达进入心理学、语言学和哲学、大脑神经科学等领域。认知互动观起初作为一种模式用来解释创造隐喻的相似性的理解,它揭示了隐喻背后机制

① 这里的“模式”指语言学上经常用图表来表示某种语言学的理论模式。

的重要认知角色,但由此产生的认知理论已是某些远离隐喻理解的深层认知探索。

英德克亚的认知互动观认为:我们的概念不是反映一些环境中先存在的结构,而是由它们创造了这个结构。然而,这个概念组织不可能是抽象的,它植根于现实。概念不仅仅是感观数据的集合,它能以不同的方式组织世界,但不能任意地组织世界。互动的机制依赖两个方面,一是我们有着认知主体的内在表征,英德克亚把它命名为概念网络;二是我们有着可供概念化的事实,通过认知主体的感觉运动,对事实进行概念化处理。

概念网络最好被看作是潜在的表征,它们独立起来没有任何意义。概念网络是在认知关系中通过把它的概念与世界的部件联系起来才能在世界中得到解释,作为认知主体并没有直接认识世界的通路,这个过程是需要以感觉运动数据装置为媒介来完成的。英德克亚将认知分为三层认知系统:认知层、知觉层及客观世界层。

二

虽然我国没有对隐喻的认知功能进行实际的系统研究,但从历史上来看,我们对西方隐喻研究中的问题并不是完全没有涉及。在我国古代文论的“比兴”研究中,有一些思想观点与隐喻就有某些契合之处。

严格说来,英语“metaphor”在汉语中没有对应的译词,译为“隐喻”,“metaphor”就失去了它在英语词源上“超越”、“传递”、“转换”之义。汉语“隐喻”二字,本身仍带有比喻的一种类型的含义。如果把隐喻看成比喻,我国对此确有悠久的历史。

在我国修辞学传统上,“比”与“风”、“雅”、“颂”、“赋”、“兴”合称“六义”,是古人文论之总纲。古人将内容方面的风雅颂与形式上的赋比兴混为一谈,写什么和怎么写不加区别。值得注意的是,“六义”及其注释从一开始就把比喻放在一个突出的位置上,以“比”统摄其余“五义”(陈子谦,1995:434)。“风”言教化,上以“风”化下,又说“风”即“讽”,下而“讽喻”上;“兴”,借物兴言他物,“取善事以劝之”;“赋”,“凡言赋者,直铺陈君之善恶,更假外物为喻,故云铺陈者也。”(贾疏:《周礼注疏》,卷二十三),“雅”、“颂”,郑玄

说：“雅，正也，言今之正者以为后世法；颂之言诵也，容也，诵今之德，广以美之。”(Ibid) 陈子谦解释说，这个“容”字正是“博依”的含义：“广譬喻也”。由此可见，比喻是六义中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

古代学者对比喻的心理活动也有论述。刘勰的《文心雕龙》(神思篇)对“形用象通”有一番意态描摹：“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故思理为妙，神与物游，神居胸臆……枢机方通，则物无隐貌……”接着一段又说：“夫神思方运，万涂竞萌，规矩虚位，刻镂无形；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我才之多少，将与风云而并驱矣。”这里刘勰实际讲的是诗文的“运思”，但又讲“想象”，其“情满、意溢”之说，也就是移情说。

虽然古人对比喻的重要性有足够的感性认识和体验，用现代语言理论来看，也不能否定其正确性，但总的说来，缺乏理性的思考，失之空泛和玄虚。当然也不可能与一般语言结合起来考察。

在现代把比喻提到更高一步来认识的是钱锺书先生。他提出了“比喻是文学语言的根本”的全称肯定命题^①，离“隐喻是语言的本质”只一步之遥了。这里的“文学”是泛指，接近一切言语活动。早在几十年前，钱锺书就指出比喻不仅是描绘能力，它是和性情、想象力、认知能力相连的。它是天才的智慧结晶，是对世界形象的认识。同时也是一种逻辑的理解，思辨的思考。他说：“我常想，每一种技巧都有逻辑的依据……一个比喻就是截割的类比类推。所比较的两桩事物中间，至少有一点相合；否则，修辞学上的比喻牵强，便是逻辑上的不伦不类。当然，比喻的好坏不尽是逻辑上的问题：诗人能见到‘貌异心同’的地方，抓住常人所未看到而想得懂的类似之点，创造新的比喻”^②。在谈到中国文评近取诸身的“人化”特点时，钱锺书说，这个特点就是把文章通盘的人化或生命化(animism)。《易·系辞》云：“近取诸身……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可以移作解释，我们把文章看成我们自己同类的活人。《文心雕龙》(风骨篇)云：“词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瘠义肥词”；又云(附会篇)：“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髓，词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义脉不流，偏枯文体”；《颜氏家训》(文章篇)云：“文间常以理致为心肾，气调为筋骨，事义为皮肤”……这些例子哪里

① 钱锺书《旧文四篇》，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② “评《落日颂》”，1933。

举得尽呢? 我们自己喜欢乱谈诗文的人, 做到批评, 还会用什么“气”、“骨”、“力”、“魄”、“脉”、“髓”、“文心”、“句眼”等名词^①。

所以, 钱锺书认为: “一切艺术鉴赏根本就是移情作用, 譬如西洋人唤文艺鉴赏为‘taste’, 就是从味觉和触觉上推类的名词。人化文评只不过是移情作用发达到最高点的产物。其实一切科学文学哲学人生观宇宙观的概念无不根源着移情作用。我们对于世界的认识, 不过是一种比喻的、象征的, 像煞有介事的诗意的认识”。

钱锺书早年就提醒人们警惕比喻的诱惑:

思想家的危险就是给比喻诱惑得忘记了被比喻的原物, 把比喻上生发出来的理论认为适用于被比喻的原物……许多思想系统实际都建立在比喻上面, 例如中庸的“中”, 潜意识的“潜”等。假使我们从修辞学立场研究这些比喻的确切性, 也许对思辨有些小帮助^②。

显然, 这里的“比喻”属于西方学界所说的死喻(dead metaphor), 或常规隐喻(conventional metaphor)。

钱锺书更进一步提出比喻“两柄多边”之说。这是对比喻研究的重大贡献。比喻“两柄多边”包含五个方面的内容: 一、比喻的两柄; 二、比喻的多边; 三、比喻的异柄同边; 四、比喻的边同柄同; 五、比喻的异柄异边。其内核为“异柄异边”。

关于比喻的两柄(two handles), 钱先生说: “同此事物, 援为比喻, 或以褒, 或以贬, 或示喜, 或示恶, 语气迥异。”如“人心如称”, 褒称之公平; 而“花者因时为衰盛, 称者视物为低昂”则斥称之不公。喻心之失正, 人之趋炎, 操权衡而量交。其两柄之说基于辩证法思想: 客观事物都具有正反两方面的属性, 修辞拟象设喻, 必然受客观事物属性的制约。境由心造, 物逐情移, 以比喻的形式去指称事物时, 常常带着强烈的主观性。

关于比喻的“多边”。钱先生说: “盖事物一而已, 然非一性一能, 逐不限于一功一效。取譬者用心或别, 着眼因殊, 指(denotation)同而旨(signification)则异; 故一事物之象可以孑立应多, 守常处变。”也就是说, 同一事物, 由于它性能和作用不是单一的, 用以比喻的人着眼点不同, 目的不一样, 指事同而喻旨异, 所以虽物象不变, 所谓“孑立、守常”, 但喻意不同, 所谓“应多

① 《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1937年5月23日), 载《文学杂志》一卷四期。

② 《管锥篇》, 论“在途求远”。

处变”，“多边”者，“多变”也。

钱锺书对于隐喻研究的贡献主要在于：一、提出了比喻是文学语言的根本的观点；二、将比喻与哲学认识、人生观、价值观联系起来；三、其两柄多边（实为“异柄异边”）说揭示了比喻中的辩证法思想。但钱先生的比喻论基本还是以文学比喻为主，持论主要在喻体的功能，对于认识的原型及其与本体的相互关系则注意不够。他还没有把比喻作为一种思维方式来认识。如前所述，这大概跟我们的“比喻”概念与“Metaphor”的含义有所不同有关。这也限制了从比喻上升到“比喻化”，上升到理查兹所说的隐喻的“无所不在原则”或莱考夫所说的思维和生存的基本方式的高度。

在研究隐喻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我们发现了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在理性思维方式的影响下，西方隐喻是以修辞中的认知逻辑开始的。如同关心整个认识过程的真假问题一样，他们也十分关心逻辑在修辞中的真假问题，经历了漫长而艰难的探索，否定了原来的纯客观理性分析，最后终于发现，人们的思维方式从本质上讲不是纯逻辑的，而只不过是隐喻式的。而在中国的文化传统里，我们的先哲虽然没有用隐喻这样的术语，他们却不自觉地、非常自然地将隐喻（象征）思维发挥得淋漓尽致。国内外不少学者都曾论及过中国哲学、艺术、思想及文化中的象征思维（或曰“形象思维”）的影响。在哲学上最具代表性的是中华元典《周易》（按最保守的说法，它成于殷周之际，比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还早几百年），其中二爻的牧牝阴阳化育，八卦揭示的演变生成法则，其思想内核与目前西方的隐喻理论有着惊人的相似。哲学上的思维方式渗透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领域，包括戏剧、文学、绘画等方面。单就文字的象形与语法的意会特点来说，其隐喻化特征就十分明显。

我们似乎没有兴趣去解析思想，因而也没有必要去考虑或怀疑我们隐喻的重要性，而在西方则不同，隐喻理论不但动摇了语言学上的纯客观主义，而且也动摇了他们以纯理性的态度看待世界和分析事物的方式。就这一点看，西方的隐喻理论似乎是向中国的整合思维靠近。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中国传统哲学由于“旨在求善，而不在求真”（冯友兰，1968），故而对隐喻思维的把握仅限于表象的和直观的层面。西方将事物放在手术台上进行解剖，而难以还原，而中国的方式是整合的、辩证的外部观察，疏于进入内部去发现其工作机制。在进行隐喻研究的时候，我们宜采用中西结合的方法，可以将西方的理性分析和中国的哲学思想和语言事实进行相互验证。